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中哲學小學史

馮友蘭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 國 哲 學 小 史

馮 友 蘭 著

百 科 小 叢 書

編主五雲王
庫文有萬
種千一集一第
史小學哲國中
著蘭友馮

路南河海上
五雲王人行發
路南河海上
館書印務商所刷印
埠各及海上
館書印務商所行發
版初月二十年二十二國民華中

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

The Complete Library

Edited by

Y. W. WONG

A SORT HISTORY OF
CHINESE PHILOSOPHY

BY FUNG YOUNG LAN.

PUBLISHED BY Y. W. WONG
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

Shanghai, China

1933

All Rights Reserved

庫文有萬

種千一集第一

總編纂者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目錄

一	孔子	一
二	墨子	九
三	孟子	一四
四	老子	一三
五	惠施公孫龍墨經	一八
六	莊子	三六
七	荀子	四三
八	五行八卦	四九
九	佛教道教與道學	五九
十	周濂溪邵康節	六五

- 十一 張橫渠及二程 七一
十二 朱子 七七
十三 陸象山王陽明 八六

中國哲學小史

哲學本一西洋名詞。今講中國哲學史，其主要工作之一，即是就中國歷史上各種學問中，將其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，選出而敘述之。中國歷史上諸種學問，其中有西洋所謂哲學之成分者，有先秦諸子之學，魏晉之玄學，隋唐之佛學，宋明之道學，及清人之義理之學。

希臘哲學家往往分哲學爲三大部：（一）物理，（二）倫理，（三）論理。其所謂物理，倫理，論理，其範圍較現在此三名所指爲廣。以現在術語言之，哲學包涵三大部，即（一）形上學，（二）人生哲學，（三）方法論。論語謂「其言性與天道」，諸子之學等學問中，其言天道之部分，即約略相等於西洋哲學中之形上學，其言性命之部分，即約略相等於西洋哲學中之人生哲學。但西洋哲學中方法論之部分，在先秦諸子之學中，尙有與約略相當者；此後講此方面者，在中國可謂絕無僅有。此後所謂道學及義理之學，固亦有其方法論，即所講爲學之方是也。不過其所講之方法，乃修養之方法，非求知之

方法耳。

魏晉之玄學，即先秦諸子之學中道家之學之繼續。隋唐之佛學，雖亦有甚大勢力，然終非中國思想之主流。清代之義理之學，乃宋明道學之繼續。故此小史所述，僅詳於先秦諸子之學，及宋明之道學。

一 孔子

中國之文化，至周而具規模。但至春秋之時，原來之周制，在社會、政治、經濟各方面，皆有根本的改變。此種種大改變發動於春秋，而完成於漢之中葉。此數百年為中國社會進化之一大過渡時期。此時期中人所遇環境之新，所受解放之大，除吾人現在所遇所受者外，在中國已往歷史中，殆無可以比之者。即在世界已往歷史中，除近代人所遇所受者外，亦殆無可以比之者。故中國之上古時期，誠歷史中之一重要時期也。

在一社會之舊制度日卽崩壞之過程中，自然有傾向於守舊之人，目覩「世風不古，人心日下」，遂起而爲舊制度之擁護者，孔子（西歷紀元前五五一—四七九）卽此等人也。不過在舊制度未搖動之時，只其爲舊之一點，便足以起人尊敬之心。若其旣已動搖，則擁護之者，欲得時君世主及一般人之信從，則必說出其所以擁護之理由，與舊制度以理論上的根據。此種工作，孔子已發其端，後來儒家者流繼之。儒家之貢獻，卽在於此。

然因大勢之所趨，當時舊制度之日卽崩壞，不因儒家之擁護而終止。繼孔子而起之士，有批評或反對舊制度者，有欲修正舊制度者，有欲另立新制度以替代舊制度者，有反對一切制度者。此皆過渡時代，舊制度失其權威，新制度尙未確定，人皆徘徊歧路之時，應有之事也。儒家旣以理論擁護舊制度，故其餘方面，與儒家意見不合者，欲使時君世主及一般人信從其主張，亦須說出其所以有其主張之理由，與之以理論上的根據。荀子所謂十二子之言，皆「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」者也。人旣有注重理論之習慣，於是所謂名家「堅白同異」等辯論之只有純理論的興趣者，亦繼之而起。蓋理論化之發端，亦卽哲學化之開始也。孔子卽此運動之開始者，故後人以之爲「至聖先師」，雖不

必對而亦非無由也。

孔子爲當時舊制度之擁護者，故其對於當時政治之主張，以爲苟欲「撥亂世而反之正」，則莫如使天子仍爲天子，諸侯仍爲諸侯，大夫仍爲大夫，陪臣仍爲陪臣，庶人仍爲庶人。使實皆如其名，此卽所謂正名主義也。孔子認此爲極重要，故論語云：「子路曰：『衛君待子而爲政，子將奚先？』子曰：『必也正名乎！』」（子路）齊景公問政於孔子，孔子對曰：「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」公曰：「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雖有粟，吾得而食諸？」（顏淵）蓋一名必有一名之定義，此定義所指，卽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爲此物者，亦卽此物之要素或概念也。如「君」之名之定義之所指，卽君之所以爲君者。「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」上君字乃指事實上之君，下君字乃指君之名，君之定義。臣父子均如此例。若使君臣父子皆如其定義，皆盡其道，則「天下有道」矣。孔子目覩當時之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」，故感慨係之，而借題發揮曰：「觚不觚，觚哉！觚哉！」（論語雍也）孔子以爲當時因名不正而亂，故欲以正名救時之弊也。

孔子對於當時政治之見解爲守舊的，但在道德哲學方面，則有甚新的見解，自成一系統，爲後

來儒家學說之基礎。此方面孔子之主要學說，爲其對於仁之見解。論語中言仁處甚多，總而言之，仁者，卽人之性情之眞的及合禮的流露，而卽本同情心以推己及人者也。論語云：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」（學而）又云：「剛毅木訥近仁。」（子路）巧言令色矯飾以媚悅人，非性情之眞的流露，故「鮮矣仁」。「剛毅木訥」之人，質樸有眞性情，故「近仁」也。論語又云：「樊遲問仁。子曰『愛人。』」（顏淵）仁以同情心爲本，故愛人爲仁也。論語又云：「憲問……『克伐怨欲不行焉，可以爲仁矣？』子曰：『可以爲難矣，仁則吾不知也。』」（憲問）焦循曰：「孟子稱公劉好貨，太王好色，與百姓同之，使有積倉而無怨曠。孟子之學，全得諸孔子。此卽己達達人，己立立人之義。必屏妃妾，減服食，而於百姓之飢寒惄離，漠不關心，則堅瓠也。故克伐怨欲不行，苦心絜身之士，孔子所不取，不如因己之欲，推以知人之欲，卽己之不欲，推以知人之不欲，絜矩取譬不難，而仁已至矣。絕己之欲，則不能通天下之志，非所以爲仁也。」（論語補疏）

孔子又云：「民之過也，各於其黨，觀過斯知仁矣。」（論語里仁）人之性情之眞的流露或有所偏而爲過，然要之爲性情之眞的流露，故「觀過斯知仁矣。」論語又云：「顏淵問仁，子曰『克己

復禮爲仁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爲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」顏淵曰：「請問其目。」子曰：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」（顏淵）仁爲人之性情之眞的，而又須爲合禮的，流露也。

論語又云：「仲弓問仁。子曰：『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在邦無怨，在家無怨。』」仲弓曰：「雍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」（雍也）又云：「子貢曰：『如有博施於民，而能濟衆，何如？可謂仁乎？』」子曰：「何事於仁！必也聖乎！」堯舜其有病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能近取譬，可爲仁之方也矣。」（雍也）「爲仁之方」在於「能近取譬」，即謂爲仁之方法在於推己以及人也。「因己之欲，推以知人之欲」，即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，即所謂忠也。「己之不欲，推以知人之不欲」，即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即所謂恕也。實行忠恕即實行仁。論語云：「子曰：『參乎，吾道一以貫之。』」曾子曰：「唯。」子出門，人問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曾子曰：「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。」（里仁）孔子一貫之道爲忠恕，亦即謂孔子一貫之道爲仁也。爲仁之方法如此簡易。故孔子曰：「仁遠乎哉，吾欲行斯仁至矣。」

宋明哲學家陸王一派，假定人本有完全的良知，假定「滿街都是聖人」，故以爲人只須順其

良知而行，卽萬不致誤。孔子初無此意。人之性情之眞的流露，本不必卽可順之而行而無不通。故孔子注重「克己復禮爲仁」。然禮猶爲外部之規範，除此外部之規範外，吾人內部尙自有可爲行爲之標準者。若「能近取譬」，推己及人，則吾人之性情之流露，自合乎適當的分際。故仁爲孔子「一貫」之道，中心之學說。故論語中亦常以仁爲人之全德之代名詞。曰：「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？」（論語述而）曰：「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？」（同上）曰：「有殺身以成仁，無求生以害仁。」（論語衛靈公）此所謂仁皆指人之全德而言也。

惟仁亦爲全德之名，故孔子常以之統攝諸德。宰予以三年之喪爲期已久，孔子謂爲不仁，是仁可包孝也。以後孟子言：「未有仁而遺其親者」；中庸言：「所求乎子以事父」，皆謂仁人或行忠恕之人自然孝也。孔子以「微子去之，箕子爲之奴，比干諫而死」爲「殷有三仁」，是仁可包忠也。以後孟子言：「未有仁而後其君者」；中庸言：「所求乎臣以事君」，皆謂仁人或行忠恕之人自然忠也。孔子謂冉子子文及陳文子：「未知焉得仁？」（論語公冶長）是仁可包智也。「仁者必有勇，（憲問）是仁可包勇也。

觀上所述，可知孔子亦注重人之性情之自由。人之性情之真的流露，只須其合禮，即是至好，吾人亦即可順之而行矣。論語曰：「子絕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」（子罕）又曰：「子曰：『可與共學，未可與適道。可與適道，未可與立。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。』」（同上）「我則異於是，無可無不可。」（微子）

蓋依上所述，吾人行為之標準，至少一部分是在內的而非在外的，是活的而非死的，是可變的而非固定的。故吾人之行為，可因時因地，隨吾人性情之所之，而有相當的不同。此所謂「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」也。此所謂「我則異於是，無可無不可」也。若對於一切，皆執一定之規則，則即所謂「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」者也。

人之性情之真的流露，只須其合禮，即是至好。至其發於行為，果為有利於社會或個人與否，不必問也。事實上凡人性情之真的及合禮的流露之發於行為者，對於社會多有利，或只少亦無害，但孔子則不十分注意於此。如三年之喪之制，本可以曾子所謂「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」（論語述而）之說，與以理論的根據；但孔子則只謂不行三年之喪，則吾心不安，行之則吾心安。（論語陽貨）此

制雖亦有使「民德歸厚」之有利的結果，但孔子不以之作三年之喪之制之理論的根據也。孔子不注重行為之結果，其一生行事，亦是如此。子路爲孔子辯護云：「君子之仕也，行其義也，道之不行，亦知之矣。」（論語微子）「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，」而猶席不暇暖，以求行道，所以石門晨門謂孔子爲「知其不可而爲之者」也。（論語衛靈公）董仲舒謂：「正其誼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。」「君子之仕也，行其義也，」卽「正其誼」、「明其道」也。至於道之果行與否，則結果也，「利」也，「功」也。不必「謀」，不必「計」矣。論語云：「子罕言利。」（子罕）孔子云：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。」（論語里仁）此孔子及孟子一貫之主張，亦卽其與墨家根本不同處也。

觀上所述，又可知孔子之哲學，極注重人之心理方面。故後來儒家皆注重心理學。孔子云：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」（論語陽貨）對於性雖未有明確的學說，然以注重心理學之故，性善性惡，遂成爲後來儒家之大問題矣。

二 墨子

墨子（西歷紀元前四七九—三八二）在孔子後，其學爲繼承孔子之儒家之反對派。墨子書中反對儒家之處甚多，蓋墨家哲學與儒家哲學之根本觀念不同。儒家「正其誼不謀其利；明其道不計其功。」而墨家則專注重「利」，專注重「功」。試就孔子個人及墨子個人之行爲考之，「孔席不暇暖，墨突不暇黔，」二人皆栖栖皇皇以救世之弊。然二人對於其自己行爲之解釋，則絕不相同。子路爲孔子解釋云：「君子之仕也，行其義也；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。」（論語微子）此謂孔子之所以欲干預政治，乃以「應該」如此。至於如此之必無結果，「道之不行」則「已知之矣。」但墨子對於其自己之行爲之意見則不然。貴義篇云：「子墨子自魯卽齊，遇故人，謂子墨子曰：『今天下莫爲義，子獨自苦而爲義，不若已。』」子墨子曰：「今有人於此，有子十人，一人耕而九人處，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。何故？食者衆而耕者寡也。今天下莫爲義，則子爲勸我者也。何故止我？」此謂爲義者雖少，然有一二人爲之，其「功」猶勝於無人爲之，其結果終是天下之「利」也。孔子乃無所爲而爲墨子，則有所爲而爲。

「功」「利」乃墨家哲學之根本意思。墨子非命上云：「子墨子言曰：『必立儀，言而毋儀，譬

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。故言必有三表。」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：「有本之者，有原之者，有用之者。於何本？於何原？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。於何原？下原察百姓耳。曰之實。於何用？發以爲刑政，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。此所謂言有三表也。」此三表中，最重要者乃其第三。「國家百姓人民之利」，乃墨子估定一切價值之標準。凡事物必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，方有價值。國家百姓人民之利，即是人民之「富」與「庶」。凡能使人民富庶之事物，皆爲有用，否者皆爲無益或有害；一切價值，皆依此估定。

人民之富庶，既爲國家百姓人民之大利。故凡對之無直接用處或對之有害者，皆當廢棄。所以吾人應尙節儉，反對奢侈。故墨子主張節用，節葬，短喪，非樂。

一切奢侈文飾，固皆不中國家人民之利，然猶非其大害。國家人民之大害，在於國家人民之互相爭鬭，無有寧息；而其所以互相爭鬭之原因，則起於人之不相愛。故墨子以兼愛之說救之。以爲兼愛之道，不惟於他人有利，且於行兼愛之道者亦有利；不惟「利他」，亦且「利自」。墨子之兼愛篇純就功利方面證兼愛之必要。此墨家兼愛之說所以與儒家之主張仁不同也。